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 2010年散文

21SHIJIZHONGGUOWENXUEDAXI
2010NIANSANWEN

◇主编/韩忠良◇本卷主编/祝勇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21世纪

中国文学大系
2010年散文

21SHIJIZHONGGUOWENXUEDAXI
2010NIANSANWEN

◇主编/韩忠良◇本卷主编/祝勇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祝 勇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年散文 / 祝勇主编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 5

(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/ 韩忠良主编)

ISBN 978-7-5313-3954-0

I ①2… II. ①祝… III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52416 号

2010 年散文

责任编辑 李殿华 施凌飞

责任校对 于文慧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380 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954-0

定价:24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序：轮与轨

祝 勇

一、戏剧性

2010年元旦刚过，史铁生出版了他的散文集《扶轮问路》；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史铁生在离他六十岁生日还差四天的时候走了。在流水账一样的散文时光中，这样的戏剧性显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它带给人的不是惊喜，而是辛酸；它修改了那本书的意义，使它由一个人的生命哲思，变成一种苍凉的告别。

史铁生说：“在你二十岁的时候，上帝就把你放那儿了，你的肉体被带到了受限制的状态下，你和别人一样，但你不能和别人一样走路。你无法躲避必须面对的就是痛苦。

“如果我问上帝为什么，我会因为得不到回答加倍痛苦；

“我常常感到搓火，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出处，或者说找不到仇人，为我正在遭受的一切注解。

“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最经常感觉到的就是限制。我时刻被

自己的身体提醒，我不能随心所欲，那么人出生是干吗来了？

“所以我老是在想，我没法不想。面对限制和由此而来的痛苦，我必须想透。”^①

从二十一岁双腿俱废，到死亡前的最后一刻，近四十年中，史铁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，他比任何人想得都多，都深，因为除了治病，他几乎无事可干，只有思想与写作，有可能超越身体的限制，就像我在那篇写于十一年前的《我读史铁生》中写道的：“史铁生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，因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。他的生活范围已十分狭小，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。众生的生命都是快镜头，如永不停息的钟摆，唯独他的生命是慢镜头，像飘浮的游丝。仿佛他从上帝那里盗取了时间，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里获得了时间。其实，他的时间来自他自己，来自他深邃幽远的冥想，来自他思想的时速，来自他每一寸时光中蕴藏的无边广阔的价值。”^②

二、人道主义

不会走的史铁生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，使它开始告别“红、光、亮”的宏大视角，开始向人性的深处挺进。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“人的文学”的理想，在20世纪里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空悬之后，在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得以实现和深化。周作人在《人的文学》中明确地说：“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，简单地说一句，是‘人的文学’。应该排斥的，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。”周作人认为，“人”的问题，在欧洲早已经得到发现和解决，而在中国却现在才要“重新发现‘人’，去

① 皮皮：《残缺》，原载《北京晚报》2011年1月3日。

② 祝勇：《我读史铁生》，见《散文叛徒》，第173页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版。

‘辟人荒’”，虽然晚了点，但“总比不学该胜一筹”。鉴于此，有必要在文学中“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”。进而，周作人对“人的文学”的文学做了如下界定：“用这人道主义为本，对于人生诸问题，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，便谓之人的文学。”并指出了两种重要的描写方法：一是从正面展现“这理想生活，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”；二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平常人的生活，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“非人的生活”。“人”是周作人对新文学理解的重要概念。所谓“人”，便是指“灵、肉一致的人”；所谓人性，便是“兽性与神性”的结合。“而一切妨碍人性的生长、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，统应该排斥。”^①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，呼唤文学中的“人”，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就是展现这健康的向上的人性。人，第一次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批评视野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周作人在此强调的“人”既有普泛意义上的“类”的概念，又有“个人”的含义，即“彼此都是人类，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”。周作人所说的“人的文学”并非“悲天悯人”或“博施济众”的慈善主义，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。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，从内容方面着眼，提倡“普通”、“真挚”的“平民文学”，把文学现代性与“人学”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，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。因而，有学者说，周作人的《人的文学》，“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‘人的文学’、‘平民文学’的旗帜，从而使文学革命由‘破坏’阶段进入‘建设’阶段，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，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。”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中国新文学实质性的宣言是周作人的《人的文学》。”^②

① 以上参见周作人：《人的文学》，见《周作人自编文集·艺术与生活》，第8~17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版。

② 秦新春：《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》，原载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1期，第65页。

如果我们是猪，我们一定乐于表达猪的喜怒哀乐，然而我们是人，所以我们所从事的文学，就不得不思考人的命题。这是常识，却是中国的写作者们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赢得的权利，因为文学中的人，在历史与政治的裹挟下，早已面目不清。这几代努力者中，就有史铁生的身影。史铁生说：“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，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。”^①于是，散文这种文体，在广场、街道以及虚空中游荡了数十年后，在史铁生那代散文写作者那里，又开始有了人的温度，有了属于人的欢乐与脆弱、迷惘与顿悟。不知史铁生是否注意过周作人的《人的文学》，但他这样阐释他心目中的“人道主义”：“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，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，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，却听凭它的灵魂被捆绑被冷冻被晾干，这能算是人道吗？”^②也就是说，实行人道主义，并非只是医生的职责，更是写作者的职责，这样才能实现普遍的人道主义。每个人的心灵深处，都有自己的伤痛甚至残缺，我们被干瘪的政治大词蛊惑得太久了，以至于羞于说出自己的怯懦、不洁和困惑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扮演着业余上帝的角色，句句是真理，而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，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。散文于是变成报纸上的社论、会议上的表态、墓碑上的铭文，正义、正确、正统，却与灵魂的真实无关。鲁迅对人性的深刻省察、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倡导，在时光的磨洗中已经音讯全无。除了面前一片板结的冻土，和一堆被视为纪念碑的石头，史铁生那代人几乎什么也看不到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史铁生开始了另一种写作——“人”的写作。与他同时，在他身后，同行者不绝如缕，

① 史铁生：《康复本义断想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30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② 史铁生：《康复本义断想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32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以至于他离世的 2010 年，这样的写作已经成为诸多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。本书为此提供了证明。不能说史铁生伟大，但至少可以说史铁生是勇敢的，因为他敢于道出生命的困顿，并无休止地追问生命的真相。在《扶轮问路》中，史铁生写道：“这五十七年我都干了些什么？——扶轮问路，扶轮问路啊！但这不仅仅是说，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，扶着轮椅，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。也不只是说，史铁生——这一处陌生的地方，如今我已经弄懂了他多少。更是说，譬如‘法轮常转’，那‘轮’与‘转’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——无限的悲怆与‘有情’，无限的蛮荒与惊醒……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，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！”^①

三、真的勇士

全球气候转暖的 21 世纪，那片冻土势力犹存。正因如此，周晓枫对女性成长历程的回望、格致对生命隐私的追思、闫文盛对琐碎人生的倾述，以及蒋蓝对历史脓疮不留情面的解剖……都被那些高尚的评论家们目为低级、下流、不堪入目而予以拒绝。对生命介入得越深，就越是遭到排斥，而那些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，则被当做高雅和正统受到热烈欢迎，实际上，这不过是“红、光、亮”在当下的翻版而已。他们似乎更热衷于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的豪迈，散文也沦为生命中的高级化妆品，而社会人生的各种复杂命题，都在耸人听闻的宣言口号中被一笔勾销了。

2011 年，一些散文写作者仿佛鲁迅所说的“真的勇士”，讲述着生命各种可能的遭遇，以及各种不同的应对策略。像一辆车上路，再有经验的司机也不可能预判所有可能的路况，也不可能

^① 史铁生：《扶轮问路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 年版。

准备充足的预案，只有实际发生时，才有对策——可能正确，也可能错误，但唯有义无反顾，才能把路走通。而那些口号、大词，则如同交规，虽放之四海皆准，但在状况发生时，只是一些正确的废话，任何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。2011年，散文写作者们留下各自的“路况”记录，比如赵瑜，在追忆他十六岁那年夏天，光着脚在院子里踩到一颗钉子时的感受，这位以报告文学见长的作家充分展现了他内心的细腻：

钉子态度坚硬，刺穿了我的脚。母亲去地里施药，父亲出了远门，哥哥也在遥远的地方当兵，妹妹在邻居家里帮忙剥玉米。我坐在地上，看着血流出来，突然决定不哭，我用力地把钉子拔了出来。那枚钉子生了锈，拔出的时候钻心地疼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测量过这一刻的疼痛，像一把盐突然放入嘴里，又或者是一种从高高的树上突然摔下来的晕眩，也有可能，是用拳头照一个人的眼睛猛力击打的晕眩。那疼痛的最后，是绝望，还有一些想要逃跑的孤独感，还有一丝丝发甜的腥味，最后又都融化了，成为一种巨大的安静。（赵瑜：《个人史》）

这样的锐痛，在生命中，或早或晚地，都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出现，尖锐，却并不持久，每个人的身体内部，都暗藏着一套止痛和修复的系统，坚强如果换一种说法，就是本能——每个人都有克制痛苦的本能；与此同时，更多的痛，是以不痛的方式发生的，它们没有残破的外表，所以止痛和修复都无从着手，只有生命的韧性，能与之对峙，即鲁迅所说的“韧的战斗”。比如闫文盛在《职业所累》中写那个在瑟瑟的秋风中数钱的小贩，“她从贴身的小包里抓出一把，一张张把它们重新捋过，扯直了，然后再放进去”，堪称传神，而他意识到“开始迷恋算计”，“在月头的时候预计月尾的收入”的自己的处境甚至不如菜市场上的小贩时，内心的痛感可想而知：

我现在和妻子说起外面的小贩。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呢？我说，我实在算不出来他们的月收入。因此在许多时候，我

觉得自己的羞涩感甚至阻碍了求知欲。我为什么不可以旁敲侧击地问一下呢？颇有几日，我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了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结。我算计他们的月收入，不是做社会调查，也不是用来攀附和嘲笑，我只是觉得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不成比例，弄得一团乱麻，进而，开始琢磨别人的生活。但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为了稍微搞得明白一点，我利用了一次次地和妻子去菜市场的机会，观察外面那些生意人的营业情况。如果他们的生意不错，连我自己都是替他们高兴的，仿佛真正做成了一笔笔生意的是我，而不是他们。受这种思想的感染，如果我把一天的时间都在虚幻的想象里浪费掉了，就会有一个直接的想象：我还不如卖菜去呢！终于有一天，我幻想着妻子会对我说，你去卖菜吧！你去卖菜可以养活我们。但实际上这一天一直没有到来。（闫文盛：《职业所累》）

闫文盛的感受在吴文光的纪录片中得到了印证，在《笔记：一个人的纪录片》中，吴文光记录了一对普通的农村夫妻的生命状态：

一直持续下来的重要内容，基本上发生在张和妻子之间、两口子的“锅碗瓢盆之类的事”，缺钱是核心话题，老婆的抱怨和丈夫张的回应，不时发生在厨房、饭桌上或黑暗的床上，一如天下所有的夫妻日子，永远没完没了的口水战争，和这没有尽头的平淡日子一样唠唠叨叨下去。当然中间也有调笑，困苦日子中的嬉戏，一种生活的调料。（吴文光：《笔记：一个人的纪录片》）

既不光明，也不灰暗，生命就这样在困顿与挣扎、失望与希望的车轮战术中持续下去。与刻骨铭心的疼痛相比，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状态，像闫文盛所承认的“世故”：“我们越过了世故的门槛，似乎人生便上了一个层次。现在我们不再追求伟大的人格了，那是远距离聚焦才能够产生的美。”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，比赵瑜十六岁的脚面对钉子更大的勇气，这群散文的写作者，被以“新”命名，恰在于他们的笔触深入到人性的各个角落，并把文学的现代性与“入学”的现代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与政治话

语调教下的“假、大、空”，“红、光、亮”分庭抗礼，恢复生命质朴的原色。好与坏的界限，简单的价值判断，在他们的文字中消失了，鲁迅笔下的“无物之阵”，却在他们笔下有了具体的形状，勇士的含义被改写，每一个面对他们的人，包括“扶轮问路”的史铁生，“在矛盾中求生存”的闫文盛赵文盛钱文盛孙文盛各种各样的文盛，以及吴文光笔下的张焕财夫妇，都是命运面前的“真的勇士”。如闫文盛所说：“所谓人间烟火，绕不开泥沙俱下和平淡沉闷喧嚣闹腾这些词。在时空掩映下的各种鸡毛蒜皮壮怀激烈都是正常有序的人生。一个充满了生存智慧的人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泥潭似的生活，然而毫无担当的利己主义者绝对让人讨厌甚至唾弃。”

四、自由

史铁生说：“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”，还说，“一个散字，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，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。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，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，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。散文，其实是怎么写都行，写什么都行，谁都能写的，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真情和灼见。在散文中，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，好比理论家见亲娘，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，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。主义越少的地方，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，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。”^①

这种自由，在本部年选中表现得尤为真切。吴文光的纪录片笔记、冯唐致古人的书信、蒋蓝的精神分析、大解的寓言式散文等等，都体现出散文的开放性和自由精神。祝勇的《刀俎间的宝座》、南子的《胡笳落雪》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小说的某些手

^① 史铁生：《康复本义断想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208~209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法。实际上，祝勇在2000年发表的《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》、2003年发表的《旧宫殿》，已经致力于在散文与小说等多种文体之间自由游走。在更早的1993年，史铁生就考虑过这个问题：“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，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。这是件好事。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，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，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的被侵犯之后，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。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。”^①这样，没有一种文体比散文更适于向人性的深处挺进，甚至可以说，散文就是人性的探测器，可以探测我们难以预想的深度，描述我们生命的真实状态。但它有自己的图像，有自己的语言系统，不是照相写实主义，有时我们不肯接受它，不是因为它不真实，而是因为它过于真实。

五、历史

2010年散文，照例充满了若干“小惊喜”，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的南子在这一年夏天出版的散文集《西域的美人时代》就是其一。我是在一年将尽时才读到这本书的，立刻被她的文字所吸引，在这部年选已经交稿之后，仍然从中选了一篇写蔡文姬的《胡笳落雪》补入本书，我对此深感庆幸，否则，我的遗憾一定深于南子的遗憾。

有些人反对以散文写历史，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，散文家的介入，使历史变得不伦不类。对于这种观点，我既同意，又不同意，总的来说是不同意。同意是因为确有很多写作者，将历史变成背书，或者兜售时光深处的小道消息，对故纸堆里的投机倒把勾当乐此不疲，正是这些伪劣产品把历史散文弄得声名狼藉；不同意是

^① 史铁生：《康复本义断想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209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因为散文的开放性，包含着所有的可能性，而“人的文学”以及它所包含的“人道主义”精神，不仅适用于今人，而且适用于古人。所有的“今人”，有朝一日也会到古人那里去报到，散文不应如此武断地划开生者与死者的行列。如同“古人”是“人”的一部分，“历史散文”也应是“散文”的一部分。在历史散文写作中，同样面临“发见‘人’”、“辟人荒”的问题。散文不是墓地，不负责陈列尸体，散文版图中的所有居民，都应带有人的光泽，他们死去已久的筋骨，会在工整有致的方形汉字中一一复活，他们衣袂飘飘，话语轻扬，带着各自的生命经验、各自的欢喜与哀愁，隔着时光与我们说话。透过纸页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、抽泣，以及热血在血管里汨汨流动。只有文学能让活着的人不死，让死去的人复活；而文学中，散文的力量至为强大。这原因，前文已经述及。是散文抹平了时间的鸿沟，在不同时空的人之间建立了灵魂的联系。这种联系是史学无法建立的。史学可以构建历史的秩序，发现历史的细节，但对于在各种历史情境中奔走的人的命运的关注、悲悯与思考，则不是文学，尤其不是散文的对手。

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，遭遇了南子的《西域的美人时代》。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，与多年前读张宏杰的历史散文时如出一辙（我于1999年将他的一堆散乱的打印稿编成《千年悖论》一书出版，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《历史的另一面》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《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》《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》等书）。尽管与张宏杰充满刚性的文字相比，南子的文字充满阴柔的美感，但这份阴柔中所蕴涵的势能，丝毫不逊于前者。我从《西域的美人时代》中选出写蔡文姬的《胡笳落雪》，是因为它如同《千年悖论》中写吴三桂的《无处收留》一样丰饶、别致、幽深，充满力量感。这种力量不仅来自历史事实本身的冲击力，更是来自“人的文学”的力量，那些“灵、肉一致的人”，在摆脱时间的封杀后脱颖而出，与这些在散文家的笔下坦露出的心灵真相相比，历史加在她（们）身上的各种头衔已经变得无足轻重。

在《无处收留》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：“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。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，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，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。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，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，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。那欢乐，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，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。而那痛苦，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，是浓黑的夜的泪水。这种泪水，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，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。无论如何，陈迹已经腐败，又通过树的汲取，进入我们的躯体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，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。”^①这正体现了新散文写作者观照历史的出发点：它不再是大而无当的宏观叙述，也不是余秋雨式的矫情造作，而是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，南子的《胡笳落雪》，以其女性写作者特有的细腻与耐心，延续了这样的关怀：“这一夜如此漫长，足以让我阅读完某个女人内心的谱系，完整而丰盈，它充满了折磨人的伤感。满目尽是一些令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。沙尘暴、尸衣、流放、遗忘、丝绸、乳汁、离散、救赎、水……最后，是一个女人坚如岩石的背影。一盏不灭的灯。”在南子的叙述中，那个被文学史反复提及的成功女性，成为一系列不幸命运的承担者——她从小失去父母，被匈奴骑兵掳往西域的蛮荒之地，作为战利品送给左贤王，在经历了十二年孤独的异域生活之后，终于归汉。“当她看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扑过来唧唧喳喳的天真模样时，那张脸一定布满了无力的温柔。当一切都变得像西域的漠风一样粗粝的时候，只有这两个孩子的脸像娇嫩新鲜的花。但是，为了永久地离开西域，蔡文姬做出了弃子回汉的决定。”曹操把她嫁给了前来接她的董祀，然而，婚后第三年，不

① 张宏杰：《无处收留》，见《千年悖论》，北京：时事出版社，2000年版。

想董祀犯了法被判死刑……蔡文姬的命运，像风中的草原一样起伏不定。南子这样描述蔡文姬的草原之夜：

她的黑色生活深不可测。在夜里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悲剧几千年后仍然存在着。那个南匈奴左贤王用笨重的身体覆盖她的身体，没完没了地要她，没完没了地要她变成他的容器，而并不知道，覆盖在他身体之下的这个女人，她的整个灵魂却在远方游荡。

但她最终还是活下来了。如果说死亡是一种恐惧，那么死亡本身就存在着诱惑。死，是为了不死——这仿佛正是诱惑她的原因。对那些苦难和生活中龌龊的存在，对于陷于生活绝望的她来说：“活下去”一直是一个秘密的存在。如今，正被一日日薄而脆的阳光所吸收。

每一天，当她沉重地睡下，听着帐外的塞风簌簌作响。先父、先母以及死去的丈夫的面容、家乡的屋檐、细雨以及雨中淋湿的长发都在回忆中一一出现，似有一只手在抚摸着她，需要她做出回答。让她带着传统的忍耐力面对这个活与不活的问题已有几个世纪。（南子：《胡笳落雪》）

这样的描述，自然不乏想象的痕迹，但它们因贴近内心而倍显真实，那些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丢失的夜晚，被南子的叙述所弥补，两千年的时光距离似乎荡然无存，剩下的，是两个同龄女性的心灵对话、一种除去了伪装的理解与体恤。

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王充间的《当人伦遭遇政治》、孙郁的《风动紫禁城》、彭程的《自由在呼唤》、冯唐的《致石涛书》中。在《当人伦遭遇政治》中，王充间对封建体制下的人伦处境充满批判和同情；在《自由在呼唤》中，彭程对陶渊明至袁中郎的精神线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；在《致石涛书》中，冯唐与身为“一堆蛋白质”的石涛对话，这种对话不是虚拟的，不是在幻想中进行，在散文中，它能真实地发生，也只有在散文中，才能推心置腹、不卑不亢；在《风动紫禁城》中，孙郁描绘了知识分子群

像，画出了他们在新旧历史夹缝中的种种神态……以上这些作品，无一是在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知识的炫耀之上，而是出自他们对“古人”生命处境的人文主义关怀。在所有的主义之上，只有这种主义，才能使散文折射出不朽的光泽。

六、轮与轨

根据史铁生的说法，“像一头黑色的猎豹，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”^①的刘易斯与不能行走的史铁生是一样的，因为无论他们的现实与梦想有多么的不同，上帝在他们各自的现实与梦想之间设置的距离是相同的；约翰逊与史铁生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在奥运会上战胜了刘易斯的飞毛腿，因服用兴奋剂而成为精神上的残疾者。以此推论，我们与史铁生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也有限制，在现实与梦想之间，也横亘着一段永恒的距离。史铁生说：“人所不能者，即是限制，即是残疾。”^②区别只在于他是在轮椅上，而我们则是靠双脚或者车轮来寻找漂泊不定的道路，或者说，我们是坐在一个更大的轮椅上，身心疲惫不堪，精神残缺不全，因而更加依赖散文，来抒发内心的郁闷、牢骚和梦想。我们需要散文，而散文则在更高的意义上解救我们，它洞悉我们内心的一切秘密，并为我们提供出路。

生命是轮，是限制，散文就是轨，是走过的印迹，更是前方的可能性。前方神秘难测，却并非杂乱无章。它在我们的想象中，在我们心中。

史铁生的路不是空间的路，而是时间的路、生命的路、灵魂的路、散文的路、人道主义的路。它不能用公里数来表达，而只

① 史铁生：《我的梦想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19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
② 《史铁生语录》，见《京华时报》，2011年1月1日。

能用年月日、用精神的厚度来记录；它不能被看见，而只能被感受。它的路在纸上延伸，从二十一岁开始，延续了近四十年。在2010年岁末合上他的书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用生命写作、沉浸于哲学玄思的人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怎样想？那最后时刻里没来得及写下的话又是什么？我们这些在史铁生这类智者的散文里成长的写作者，会比他更睿智吗？进化论在散文领域存在吗？“人的文学”能在纸页的接力中，像电脑软件一样不断升级吗？思考越多，问题也就越多，而散文，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其意义恰在接踵而至的探索与追问中，如史铁生在获得“庄重文文学奖”时的书面发言中所说：“有终极发问，但无终极答案，这算什么事？这可能算一个悖论：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，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，发问即是答案。因为，这发问的过程，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。”^①

七、年轮

与几种提前出版的散文年选相比，我主持的“春风版”，每年都是最晚出版的，原因是我不愿遗漏那些在年底问世的作品，而在此前，其他几种年选早已争先恐后地交稿付梓。与面对市场的迫不及待相比，面对创作的等待与耐心似乎更加重要。否则，所谓年选就会缺斤短两，因为它并非一整年的选本，也不会构成一部准确的“断代史”。那些不幸在一年的最后时刻发表的散文，将向那些以“权威”命名的选本提出抗议。

一年的散文佳作到底能有多少种排列方式？我以前编的选本，大多根据主题、内容分出栏目，本书第一次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篇目，或许别有意趣。至少，它具有发生学的意义，可

^① 史铁生：《获“庄重文文学奖”时的书面发言》，见《史铁生散文》，上卷，第248页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